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中国目录学史稿

■ 吕绍虞 著



根深叶茂 历久弥新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中国目录学史稿

吕绍虞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目录学史稿/吕绍虞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9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09931-9

I. 中… II. 吕… III. 目录学史—中国 IV. 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0342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喀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5 字数: 175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931-9/G · 2550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再 版 说 明

《中国目录学史稿》是吕绍虞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本书从 1963 年底开始撰写，由于“文化大革命”仅完成原计划十分之七、八。本书全稿，由查启森同志整理汇辑成篇，内容稍有增补和重加编排。现我社将此书列入《百年名典》重新出版，以资纪念。再版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为基础，仅作少量修改，力求保持本书原貌。

前　　言

吕绍虞先生（1907—1979年），浙江新昌人，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先生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学与研究，生平著述甚多。据先生手订《编译四十年（1932—1972）记》载：四十年中，在全国各地17种报纸、34种杂志上共发表了146篇论文，另编译和出版了专业书籍39种。先生晚年尤致力于目录学的研究工作，除本书外，尚有《普通目录学》等著作。

本书是先生最后的一本专著。从1963年底开始撰写，至“文化大革命”时中辍，按原计划仅完成全书的十分之七八。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生不禁摧残，身染重病，直至逝世前终未能完稿，这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损失。

我作为吕先生的学生，蒙先生错爱，在他逝世前，将这部书稿寄赠于我。当时我远在四川，待我收到这部书稿，还未及拜读完毕，就接到先生辞世的噩耗，睹物思情，哀不能禁。为了不辜负先生的信托，也为了寄托我的哀思，对于先生的遗赠，不敢自专，于是依原稿请人眷录，稍加整理，就在先生去世不久，在《四川图书馆学报》开始刊载。从那时开始，《四川图书馆学报》每期以大量篇幅增辟专栏，连续刊载两年，使得先生这部尚未行世的稿本，能及时与广大读者见面。

《四川图书馆学报》是在图书馆界颇有影响的一份刊物。《世界图书》杂志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这份刊物时，特别提到吕先生的这部著作，说“此书是吕先生生前的力作，内容丰富，富有创见，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目录学专著”。文章给予“史稿”以很高的评价。此后，有不少论文和专著引用了“史稿”的观点和资料。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这部书稿，主要是依先生原稿发表的；但由于原稿是一个草稿，其中有许多阙文，是先生准备以后补订而又没有来得及补订的。我作为整理者，不得不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其间若有错误是要由我负责的。

此外，如前所述，先生于全书仅完成十分之七八，所以这部书稿是一部未完稿。据先生计划，这部目录学史是要写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而实际上所完成的，只迄于近代。即使近代，其最后四节也仅有提纲，并无全文。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目录学史稿，我便依据“提纲”，将先生有关著述汇辑起来，加以编排整理，除其间略有补充外，我叙述的基本上还是先生的原文。至于其余未完成而又没有提纲的，我就不敢续貂了。这主要是为了保持先生原著的面貌。

借先生这部书稿出版的机会，谨向读者说明其原委，并对先期发表它的《四川图书馆学报》和现在出版它的出版社以及关心它的徐召勋同志谨致谢意，也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查启森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目录学的初期阶段和《别录》、《七略》、 《汉书·艺文志》的诞生	1
第一节 我国目录学的初期阶段	1
一、我国目录学的起源	1
二、孔子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编次	2
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和杨仆的纪奏兵录	4
第二节 《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诞生	5
一、《别录》《七略》	5
二、《汉书·艺文志》	28
第二章 从公元3世纪到7世纪我国目录学的发展 (自魏至隋末)	36
第一节 国家藏书目录和全国图书总目简介	36
一、国家藏书目录	36
二、全国图书总目	38
第二节 分类体系的变革	39
第三节 全国图书总目的产生	46
第四节 佛经目录的产生和发展	50
一、重要佛经目录简介	50
二、佛经目录的特点和成就	53

第三章 从公元 7 世纪到 14 世纪末叶我国目录学的 发展 (自唐至元末)	57
第一节 各种重要目录简介	57
一、国家藏书目录	57
二、正史艺文志	60
三、通史艺文志	62
四、私家藏书目录	64
第二节 著录方法的改进和著录项目的增加	66
第三节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和类目的说明	68
第四节 成文解题的出现	81
第五节 郑樵的《通志·校讎略》	82
一、关于著录范围和著录方法	85
二、关于类例和类书	90
三、关于解题	95
四、关于编次	96
第六节 佛经目录的进一步发展	98
 第四章 从公元 14 世纪末叶到 19 世纪中叶我国目录学的 发展 (自明至鸦片战争)	103
第一节 各种重要的目录简介	104
一、国家藏书目录	104
二、正史艺文志	105
三、私家藏书目录	106
四、善本目录	109
五、专科目录	110
第二节 著录方法的发展	114
第三节 四部法的动摇	116
第四节 善本目录的产生及其编制方法	134
第五节 正史艺文志的体例和补史艺文志	137
第六节 章学诚的《校讎通义》	140

一、关于著录方面的	140
二、关于（部次）分类方面的	141
三、关于叙录方面的	143
四、关于互著、别裁的	143
五、关于治书和校书的	144
六、对刘班的一些意见	145
七、对郑樵、焦竑的几点意见	147
八、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149
第五章 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发展（自鸦片战争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158
第一节 国学举要书目和新学书目的产生及其 在编制方法上的特点	158
第二节 新学书籍产生后的各种目录分类方法	161
第三节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步书刊的目录	163
第四节 国学举要书目和禁书目录	165
第五节 “五四”以后图书馆目录方法上的巨大变化	166
一、分类体系的改变	166
二、著者号码的采用	168
三、编目条例的规定	168
四、人名、书名、标题、字典式目录及 联合目录的出现	169
五、卡片目录的应用和排印目录片的刊行	170
第六节 书刊索引工作的开展及其多种多样的编制方法	171
第七节 专科目录和地方文献目录方法的改进	182
一、专科目录	182
二、地方文献目录	184
第八节 近代目录学著作中对目录学对象的各种不同看法	186

第一章 我国目录学的初期阶段和 《别录》、《七略》、《汉书· 艺文志》的诞生

第一节 我国目录学的初期阶段

一、我国目录学的起源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已有了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我国的文化典籍是非常丰富的，远在夏、商时代就有为数不少的、由史官执笔的典籍。《尚书·周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晋文公时（公元前636年）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左氏》、《墨子》都曾引过《夏书》、《殷书》。《竹书纪年》记载夏以来的事情。《吕氏春秋》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隋书·经籍志·簿录篇》序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复可知。”古代史官记言记事，积累大量典籍，掌管一切有关文化的记载，子孙世代传习，供少数贵族的咨询与使用。为了便于检查和利用，很可能有目录的编制。由于年代久远，不但目录没有流传下来，甚至史籍上也没有点滴的记载，体例如

何，也就无法了解。根据这一推测，从商朝已有史官说起，我国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我国目录学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即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到公元前 12 世纪的殷商时代就开始产生了。

二、孔子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编次

西周和春秋时代，社会生产力比之商朝更加发展，古代学术已渐发达，典籍也日益增多。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的创始人。他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为了教学上的需要，收集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号为“六艺”，亦称“六经”。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使学术不再为世袭贵族所垄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对于古代学术文化的总结和传播，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同时，他对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编次，在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孔子删定“六经”，是“述而不作”，保存原来的文辞，但是有所选择，那就是删去芜杂荒诞的篇章，“不语怪力乱神”；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孔子是怎样编次《书经》和《诗经》的。

《书经》也称《尚书》，简称曰《书》，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

孔子选取史官所藏的历代重要文献，上起《尧典》，下迄《秦誓》，相传共有百篇，事实上有些篇章（如《禹贡》）是后儒补充进去的，原订篇数，无可稽考。秦焚书后，存留仅 29 篇。按时代（虞、夏、商、周）编次。据说他又给每篇写了一段极简单的文字，说明为什么要作这一篇。这就是所谓“言其作意”的书序。

如《盘庚》序说“盘庚五迁，将治毫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据说当时有三千篇，孔子选取了311篇，亡佚6篇，现存305篇，概称为三百篇。按性质（体裁）和地域分类编次。

《诗经》各篇，先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又分为二南、十三国风。十三国风各以国名；

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颂又分为周、鲁、商。

每篇诗也有言其作意的诗序。如《灵台》一篇，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据说诗序是子夏或子夏以后的人，根据孔子传诗的大意写出来的。

孔子整理古代历史文献和古代诗歌，首先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审慎的鉴别，然后将选取的篇章按照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书经》是按时代编次的。《诗经》是按性质和地域分类编次的，各篇又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如《诗经》的“《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各篇并有言其作意的序录。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这一系列的工作，正是目录工作，这些工作方法，也正是目录学的基本方法。

《书经》和《诗经》的目录，据说原来是附在书后的，也有单本流传。《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这是《书经》目录单本流传的明证。

无论《书经》和《诗经》的目录，附在书后或单本流传，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为《书经》和《诗经》编出了目录。《书经》和《诗经》是各有其目录的。

《书经》和《诗经》的目录，一般说是一书的目录。这对整部《书经》和《诗经》来讲是不差的，但也可以说是群书的目录。正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所说“因为当时的书用竹简编写，繁重得很，我们看作一篇，在那时已是一册；我们看作一部，在那时是一大堆。所以对于书籍的概念，我们可以用部计而他们不能。他们只能说，这类东西叫做《诗》，那类东西叫做《书》而已。”“《诗》

和《书》是当时的两类书。”

由于《书经》和《诗经》所收录的是古代历史文献和古代诗歌，并且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选择出来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说《书经》和《诗经》的目录是专科目录和举要目录。

《诗经》、《书经》之序，是不是孔子或孔门弟子根据孔子传授的大意编写出来的，后人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孔子当时编次《书经》和《诗经》，未尝撰述序录，我们认为这也无损于目录的组成。《诗经》、《书经》之序，就是我们现在的解题或提要一类性质的文字。目录有无解题，是一个详略的问题，目录可以有解题，也可以没有解题，并不是任何一种目录非有不可的。自然，解题丰富了目录的内容，也更有利于读者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书序》和《诗序》是什么时候写成的，这个问题同样没有定论。若是在《别录》、《七略》编成以后由后儒补写上去的，就不能以《诗经》、《书经》之序放在《别录》、《七略》以前来论述我国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即使是在《别录》、《七略》编成以前由后儒补写上去的，以《诗经》、《书经》之序来论述我国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如《隋书·经籍志·簿录篇》序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说“孔子删《书经》，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又有人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也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解题工作不能完全替代目录工作，解题只是目录学上提示图书或资料内容的一种方式方法，这说明他们仅仅看到了《书序》和《诗序》，而没有注意到孔子编次《书经》和《诗经》的其他方面同样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工作。

孔子编次古代历史文献和古代诗歌的工作方法，为后世目录工作树立了榜样。

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和杨仆的纪奏兵录

张良、韩信的序次兵法和杨仆的纪奏兵录，与孔子编次古代历史文献与古代诗歌的方法，大致是相仿的。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

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

张良、韩信的序次兵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定著的三十五家，在组织形式上当是和孔子整理和编次古代历史文献和古代诗歌差不多，那就是兵书汇编本。它的编次，也应有一定的顺序。为什么是兵书汇编本呢？因为盗窃的人，盗去兵书目录是没有用处的。为什么是有一定顺序呢？这从“序次兵法”的“序次”二字可以看出来的。杨仆的兵录，应该也是兵书汇编本，书后当附有目录，定著各书有无解题，则很难臆断。

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和杨仆的纪奏兵录，继承了孔子整理和编次古代历史文献和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也为刘向父子的目录工作开辟了道路。

第二节 《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诞生

一、《别录》《七略》

《别录》、《七略》是西汉末期的国家藏书目录，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编成的国家藏书目录。

西汉国家藏书的基础是秦代的遗书。《史记·肖相国世家》说：“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到汉武帝的时候，以“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如淳注引刘歆《七略》说：“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到了汉成帝的时候，“以书颇散亡，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经过了这两次全国性的普遍征集，西汉国家藏书，已是相当丰富了。《别录》、《七略》就是根据这个藏书编撰出来的。刘向以前，汉代国家藏书，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在汉高祖和汉武帝的时候，仅就兵书部分加以整理，而大规模地进行整理国家藏书，并且编成了目录，还是从刘向开

始的。

汉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同时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汉书·艺文志》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七录·序》也说：“至孝成之世……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父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逐总括群篇，奏其《七略》。……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术数略》，次《方技略》。”

《别录》、《七略》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 内容概述

《别录》20卷，刘向撰，《七略》7卷，刘歆撰。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丰人（今江苏徐州）。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治《穀梁春秋》。初为谏议大夫，数上封事，痛论外戚专擅之祸。元帝时，为中垒校尉。成帝即位，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卒年72岁。全部校书工作没有完成。除《别录》外，另著有《洪范五行传》、《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书。

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是刘向最小的儿子。约生于汉宣帝甘露初年（公元前53—前50年）。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河平三年，和他父亲刘向同时受诏，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

歆宗室有才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歆治经力主古文，欲建列《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为众儒所讪，出为太守。王莽篡位，歆为国师。旋谋诛莽，更始元年，自杀。

向、歆“父子具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

参加编校中秘书的除了任宏、尹咸、李柱国三人以外，还有杜参、班淳、王龚、望（失其姓）等人。

古代典籍多以简策书写，简重丝细，日子久了，就很容易散乱，而且各篇单行，分合自由，不像后世的紧结固定，所以，还须经过一番校讎，才能进行目录的编制工作。

“校讎”，古时称为“讎校”。《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说：“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刘向的校讎工作，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是集中一书各种不同的本子，互相比较。例如，《晏子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三十篇，为三百三十八章。”《管子叙录》：“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申子叙录》：“今民间所有上下两篇，中书六篇，皆合。”然后校讎讹文脱简，例如《尚书》：“臣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战国策》“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

其中有的书籍，中外本的篇章各有残缺或彼此重复的，则互相补充，除去重复。例如《战国策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战国策》，中书余卷错乱相糅杂。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